

## 《冥报记》的古抄本与传承

李铭敬

—

《冥报记》是一部唐代初期宣扬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宣教小说集。《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中云：“…所撰《冥报记》二卷，大行于世。”此书成书不久，便有郎余令的续作《冥报拾遗》出现，顾况的《戴氏广异记》中亦举其篇名，大型类书《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均有引载。宋以后随着佛教的衰颓，此书失传，只有其引载篇则偶有转引，且讹谬层生。

然而此书正如《游仙窟》等在中国久成佚书的作品一样，长期以来被保存在日本。清末杨守敬于日本访书，得此书的一个抄本，杨氏《日本访书志》卷八云相传是三缘山寺写本。日人森立之、涩江全善所著《经籍访古志》<sup>①</sup>中亦著录三缘山某院藏本《冥报记》，故日本学者一般称此抄本为“三缘山寺本”。杨氏据此合《珠林》《广记》所引，辑为一书，即《冥报记》六卷，《冥报拾遗》四卷，合计十卷，以应《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十卷的著录。民国7年（1918）上海涵芬楼依照另一抄本即高山寺古抄本印出，收入《涵芬楼秘笈》第六辑四种，共八册一函。从此《冥报记》原文得以重归故里。民国34年岑仲勉先生所撰《唐临冥报记之复原》<sup>②</sup>一文即依此本。1992年中华书局作为“古小说丛刊”的一册印出方诗铭先生辑校的《冥报记》（与《广异记》合为一册），

此校本亦以影印高山寺古抄本为底本，但同时校以日本《大藏经》本校勘记中所引的知恩院本和三缘山寺本的自序和目录，以及《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所引篇则，是目前较为完备的一个校本。另外，1993年12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剑国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收有《冥报记》一项，书中据涵芬楼本并比附杨守敬的《冥报记辑目》对《冥报记》进行了考说。

以上大致为国内《冥报记》的整理著录情况。上面所提到的古抄本主要有三个，即是：1 高山寺本；2 知恩院本；3 三缘山寺本。高山寺本为现存最古的一个抄本，藏于日本京都高山寺。此抄本为卷子本，上中下三卷，上卷十一条，开首篇前有作者唐临的序；中卷十九条，其中“苏长”一条重复抄出，实十八条；下卷二十四条，共五十三条。此抄本亦称作奈良朝旧抄本，相传为空海的弟子圆行于日本承和五年（838）游学唐朝时请唐人书写，携带回国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等认为此抄本“用笔遒健，风神妍媚，不坠中唐以后”<sup>③</sup>，当为唐人写本。方诗铭先生亦认为此抄本唐人笔意很重。日本宽文八年（1668）黄蘖宗沙门道越曾经借得此抄本而复抄，后来临济宗僧人无著道忠<sup>④</sup>以道越抄本<sup>⑤</sup>，藉《法苑珠林》和《法华传记》作过校对，著成《冥报记校讹》<sup>⑥</sup>。近代以后印行的诸本多为高山寺抄本，比如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上卷影印，明治四十三年（1910）照相版复制，大正二年（1913）活字翻版而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昭和三十年（1955）内田道夫编印的刻印翻版《校本冥报记》，昭和五十六年（1981）日本同朋社的照片版，以及上面所说的民国七年（1918）的《涵芬楼秘芨》本和中华书局排印本等均为高山寺抄本或以此为底本。

知恩院本为京都知恩院所藏。上中下三卷，上卷十一条，中卷十三条，下卷十七条，共计四十一条。比高山寺抄本少十三条。《大正大藏经》所收本列为参校本。此抄本至今尚无有影印本刊行。日本杂志《学苑》<sup>⑦</sup>1993年八、九期合刊号刊载此抄本的活字翻版。

据所载的图片（序和上卷第一条的一部分）看来，当是行楷书体。

三缘山寺本，据《经籍访古志》云：“《冥报记》三卷，旧抄卷子本，三缘山某院藏。卷首题冥报记卷上，吏部尚书唐临撰。次有序文，论当时报、累年报、子孙报、现报、生报、得报之别。上卷始隋释信行，终扬州严恭；中卷始隋大业中客僧，终邵师弁；下卷始后魏崔浩，终武德中姓韦。皆载其冥报事迹。界长七寸六分，幅七分，每行十六七字至十九字。不记抄写时月，审是四百年许前书本也。卷首二张缺，以高山寺本补完。”

台湾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三缘山抄本。据阿部隆一著《中国访书志》<sup>⑤</sup>介绍，该抄本为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影写的三缘山抄本，封皮浅蓝色（26.8×19.2厘米），上有“东叡山文库”的横书小字题签。扉页内面用日文说明是以三缘山会下彻定寮古本模写。寮本为保元时代写本，古色古香。但卷初旧缺四十三行，以近世梅尾高山寺本补写之。

清末杨守敬于日本访书，得三缘山抄本，《日本访古志》卷八云：“余于日本得古抄本三卷，首题吏部尚书唐临撰，有临自序。上卷十一条，中卷十六条，下卷十六条，相传是三缘山保元间写本。首缺四三行，以高山寺藏本补之。”永山近彰认为杨氏所得三缘山本与《经籍访古志》所云三缘山某院藏本当属同一抄本，但又指出两书中所述抄写年代不同，亦不知所据为何，当存疑。另外，查检杨氏的《冥报记辑本目录》，“扬州严恭”条不在上卷末而在中卷，“隋大业客僧”条下未注出自古抄本，与三缘山某院藏本各卷首尾不相吻合，且所云上中两卷的条数与辑本目录的实际条数不符。上卷十条，其中“唐彻禅师”条与“唐释僧彻”为同一条，辑目中重出，实则九条，不应为十一条。中卷为十三条，亦不应为十一条<sup>⑨</sup>。由此看来，辑目中存在着杨氏自身的差错。抑或是三缘山某院藏本为“日本释子所节抄而又臆分为三卷”的抄本。此抄本当是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抄本，依阿部氏著述，该博

物院尚存两本明治时期的故宫博物院藏本的影印本，其中一本中写有杨氏与《广记》、《珠林》等的校对。

阿部氏指出：三缘山某院藏本后来不见有人提及，按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扉页上的记事可知原藏于彻定寮。彻定后来移居知恩院，很多典籍随之转移到知恩院，所以三缘山某院藏本可能就是现在的知恩院本。笔者曾按《经籍访古志》里所述三缘山某院藏本上中下各卷的起止条目对照知恩院翻版本，皆首尾一致。用杨氏《日本访书志》卷八所附《冥报记》序与高山寺等其他诸本相校，其相异处亦与知恩院本相吻合。另外，杨氏于光绪辛丑年间梓行《留真谱新编》，内载所获《冥报记》上卷前的序文第一行及次后五行的各行始止二字，以此与《学苑》杂志上所附知恩院本的此页的影印对照，完全一致。因此，综合各方面来看，两者为同一写本的可能性很大。

## 二

上面谈了高山寺、知恩院、三缘山三个古抄本，但实际上日本还存在着一个古抄本，即前田家本。这个抄本目前国内学者似乎尚未知晓，故特列一节，略加详述。

此抄本藏于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为日本长治二年（1105）的古抄本，亦称长治本。此抄本三卷一册，属粘页册子本，长28.8厘米、宽15厘米，用楮纸书写，每页7行，每行十八九字至二十二字不等。通卷附有日语式训读法的助读符号“乎(を)”“古止(こと)”等，并用红笔标出与它本的校异及字音的反切。封面亦用同样纸张，稍厚，上书“冥报记上中下”。每卷卷首第一行顶头书写“冥报记上(或中或下)”，下空六、七字题写“吏部尚书唐临撰”；每卷卷末空一行顶头书写“冥报记上(或中或下)”。终卷末记有“长治二年八月十五日书了为令法久住往生极乐也”，次行齐“久”字书有三字，首二字涂抹不清，后一字为“之”字。

据永山近彰《国宝长治二年抄本冥报记解题》<sup>⑩</sup>推测，此抄本收归前田家藏书，可能始自江户时代（1600—1867）中期的加贺藩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此人推奖学问，曾召集木下顺庵、室鸠巢等当时的朱子学派名流，收集、刊行古书，于学问之发达做出过贡献。至于在此之前收藏情况已无从知晓。昭和十四年（1939），此抄本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前田家本与高山寺本相比，文字上存在着不少差异，有着较多明显的错抄和漏抄现象，不能算是一个好的抄本。另外，中、下两卷在各自卷内的排列顺序亦与高山寺本不同。在书写形式方面，各篇故事后面作者交待的见闻来由部分，有的高山寺本用大字（与故事内容部分字体一样大小）抄写的而前田本却分成两行夹注的形式用小字抄写，相反的情况亦存在。由此看来，前田家本与高山寺本可能属于不同系统的两个抄本。

前田家本不同于高山寺和其他抄本的最大之处是，它上卷十一条，中卷二十条，下卷二十六条，三卷合计共五十七条，较其他抄本中条数最多的高山寺本多出四条。这四条分别是前田家本中卷的“唐李思一”、“唐周善通”，下卷的“唐李寿”、“唐得并（傅奕）”。杨守敬的《冥报记辑本目录》卷四、卷五分别辑入“李寿”和“唐傅奕”，《冥报拾遗辑本目录》卷二辑入“李思一”。上面所提到的岑仲勉、方诗铭、李剑国三人的文章里，均就高山寺本所载以外的《冥报记》条目作过考说，但是由于未得见此抄本，亦皆有所误漏。岑氏考说以各条末之“具陈闻见由缘”为依据，略失偏颇，四条中仅收“李寿”、“李思一”两条；方氏《冥报记补遗》收入“唐李寿”、“唐傅奕”两条；李氏在岑氏考出的两条之上又指出“唐傅奕”一条，得出三条。但“周善通”一条皆未知。笔者以为这可能与此条不为后来《法苑珠林》等书所引有关。

另外，此抄本的中卷“苏长”一条，紧接在前面“董雄”一条之后抄起，未单列一条。这与高山寺本“苏长”一条隔“董

雄”条前后重出的问题似乎不无关联。高山寺本“董雄”之后的“苏长”条亦未单列，是紧接着“董雄”条抄起的。知恩院本未能亲见，但依其翻版看，是“董雄”条在前，“苏长”条在后。高山寺本重出的两条“苏长”前条是行书，后条是真书，文字略有不同，前条后半部似有遗漏。知恩院本翻版的“苏长”条，前半部分与前条近似，后半部分与后条相近，但亦有遗漏，似乎所用底本是个残缺本。前田家本文字几乎同于高山寺本后条。关于高山寺本“苏长”条的重出问题，方诗铭先生指出：“高山寺本应来源于两个不同的底本。后者（真书抄写者。笔者注）从《董雄》条次行开始抄写，发现紧接着的《苏长》条与所据底本不同，就随手重抄了这一条。”“但就前田家本和知恩院本皆无出现重复，且都在“董雄”条后这一点来看，有可能“苏长”条本应在“董雄”条之后，前行书抄写者抄写时漏掉“董行”条直接抄了“苏长”条，真书抄写者发现后，便又返回到“董行”条抄起，故产生了这一现象。然而，两条的文字上存在着略微差异，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写本的祖本或传承问题。所以仍属推测。

以上几个古写本，高山寺本与前田家本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来自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知恩院本较高山寺本更接近前田家本，片寄正义认为它兼有高山、前田两个写本的性质，当属其两者之间的中间本<sup>⑪</sup>。

《冥报记》版本除以上介绍的几个古抄本外，存于日本的尚有收入明治四十五年刊行的《大日本续藏经》本，但所依底本不明。此本亦是三卷本，有序文，各卷的条数及排列与高山寺本一致，当为高山寺写本同一系统版本。另有以高山寺本为底本的活字翻版《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和《高山寺资料丛书》第十七册所收本<sup>⑫</sup>等。前者以知恩院本和《大日本续藏经》本校出，后者与尊经阁藏前田家本的复制本作校，并依知恩院本的照片标出与其原文的异同，同时还附有高山寺写本的影印、汉字总索引等。知恩院本虽尚无

刊行，但《学苑》已刊出其翻版本。前田家本于昭和十二年（1937）作为《前田家尊经阁丛刊》的一册限定刊行过三百部。平成十一年（1999）二月勉成社出版的《冥报记的研究》第一卷收有此抄本的彩色影印和注释等。

### 三

《冥报记》成书于唐初永徽年间（650—655），依岑仲勉先生考说，当为永徽四年（653）。据《旧唐书·唐临传》云，书成之后，“大行于世”。不久就出现了其续书——郎余令的《冥报拾遗》，道世的大型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亦大量征引过此书。就目前所知，此书的记录最早见于《法苑珠林》（卷一〇〇杂集部第三）。此后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册府元龟》、《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绛云楼书目》等均有著录，且都称此书为两卷。但是，上面介绍的存于日本的几个古抄本均为三卷本。这是怎么回事呢？个中原因至今是一个谜。另外，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的汉籍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为十卷。杨守敬认为十卷本为确，两卷本的著录皆误。内藤湖南认为三卷本当为其本来面目。中国学者皆尊本国史录，持两卷本之说，认为日本的古抄本为节抄本或残本。

宋以后，此书失传，仅藉佛教典籍、类书、小说集等的引载流传于世。关于《冥报记》的引用或转引书，方诗铭、李剑国诸先生已经指出许多<sup>⑩</sup>。例如除早已皆知的《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冥报拾遗》外，还指出《弘赞法华传》、《法华传记》、《三宝感应要略录》、《独异志》、《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古今说海》、《古今说荟》、《唐代丛书》、《旧小说》等。笔者根据在日本的资料，又发现了一些。比如《神州三宝感通录》、《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义楚六帖》等书中亦有引载。其

中引用最多的，是《法苑珠林》和《太平广记》。在此两书中，有高山寺本等几个古写本中所未见的条目，岑仲勉从两书中指出七条，方诗铭指出了十五条，李剑国指出了十九条。但因三位先生均未见到前田家本，所指出的条数与现存本当有出入。另据指出：《玉泉子》、《酉阳杂俎》中，以及《永乐大典》七五四三卷所引《金刚证验赋》以及陈诗道的诗《次韵苏公劝酒》等亦有沿用改袭《冥报记》之处。

至于这些书中的引用，有的是直接引用，有的是转引，情况不一，笔者拟另撰文探讨。但总的来看，可以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冥报记》的引用书大都集中于唐、宋，且以佛教方面的书为主。佛教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隋唐，宋以后呈现颓势。《冥报记》作为宣扬佛教因果报应的宣教小说，有着明显的随佛教盛衰而盛衰的特点。唐初佛教兴盛时期，《冥报记》一问世，便“大行于世”，随后不久，就出现了续作——郎余令的《冥报拾遗》，以《法苑珠林》为首的佛教书亦相继引用。宋以后，随着佛教信仰的衰退，《冥报记》遂失传。第二，同时代（唐代）作品的引载多数为直接引载，且集中于佛教类书；宋以后，版本失传，转载现象明显，以《太平广记》为中心，小说类书、小说集等的引载遂出现混乱，引载状况呈现复杂化。第三，《法苑珠林》和《太平广记》两部大型类书是《冥报记》转播的两个中心塔，而且有着从《珠林》到《广记》、又从《广记》到宋以后的诸作品的传播趋向。《珠林》在《文记》以前起了重要的传播作用，但是在佛教退场后，《广记》为《冥报记》在文学世界中的传承扮演着主要角色。

#### 四

上面已经提及过，《冥报记》高山寺写本据传是日本僧人圆行来中国时携带回國的。三卷写本装在标有明治年间制作的木盒里，其盒盖背面写有：

圆行阿闍梨承和五年入唐之日以 皇朝官纸  
所令书书写也 旧唐书唐临传方便智院慧友护  
闍梨自书也

七十八老信充记  
(朱方印) 信充

现存的包纸上有如下记载：

甲五十四箱 唐临 三卷

圆行阿闍梨将来唐人书

慧友、信充是何许人氏无从可考。圆行是日本平安朝前期的天台密宗僧人，日本承和五年（838）作为请益僧（短期研究员）派来中国至长安学习密教。江户初期的《本朝高僧传》载有其入唐带来的书目，但书目中未见有《冥报记》的著录。

就现在所知，《冥报记》较早见于日本典籍记录的有《日本灵异记》、《东大寺讽诵文稿》、《日本国见在书目》等。《日本灵异记》全称为《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是在《冥报记》的直接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宣扬因果报应思想的佛教小说集，在这部书的上卷序文中这样写到：

昔汉地造《冥报记》，大唐国作《般若验记》，何唯慎乎他□（国）传录，弗信恐乎自土奇事。

此书的撰者景戒接触到《冥报记》等中国作品，受到刺激，产生了创作意欲，编撰了这部作品集。此书不仅编撰动机受到《冥报记》的强烈影响，而且从其编撰的主题、内容等各方面亦能窥到其浓厚的影子。据《日本灵异记》前田家写本可以推断，此书在延历六年（787）即已起稿。延历六年相当于中国的唐朝德宗贞元年间，是《冥报记》出现后一百三十多年的中唐时期。由此可见，《冥报记》在奈良时代（710—794）即已传入日本。

《东大寺讽诵文稿》是一本类似于在法会上诵读用的教化文本草稿抑或备忘录。此文稿原本已失于太平洋战火，有复制本留存。

该书第二百零一行有如下的记述：

此国见地狱者纪国有文寺佃人子，走其田之稻茎作刀云。

又《冥报记》《灵异记》云云。

中田祝夫氏推测其成书时间为平安初期、延历十五年以后<sup>⑭</sup>。其次成于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7）的《日本国见在目录》亦著录“冥报记（记）十卷”。方诗铭先生因未见前述资料，称此著录为最早，当更正。

日本文学里有一体裁称为“说话文学”，类似于中国的志人志怪或笔记小说集，按内容可大致分为佛教说话集和世俗说话集。上面说到的《日本灵异记》是日本佛教说话集的滥觞。另有一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亦是以佛教说话为中心编撰的，共三十一卷（内有三卷为缺卷），按佛教的起源流布将内容分为天竺部、震旦部、本朝部三部分，构成代表日本说话文学的最高峰。其中，震旦部里收入《冥报记》作品四十八条（因属于震旦部的第八卷为缺卷，收入的可能还有），这四十八条当中，绝大多数是依据前田家写本系统进行翻译的。可见这部作品集吸收《冥报记》条目之多和受其影响之大是惊人的。综括而言，《冥报记》在日本说话文学这一门类中所给予它的影响是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冥报记》跨越国界，与日本文学结下了深厚的文学因缘。

## 五

《冥报记》这部佛教小说集，国内的研究似乎还比较寂寞。杨守敬于异国摭拾佚卷，殊为可贵；岑仲勉以史家之慧眼，去伪存精，近乎精当。方诗铭、李剑国等在此基础上，补遗前说，使之更加完备。尤其是方氏辑校本收入“古小说丛刊”，使此书为一般人可得，其功不小。但是以上所列大都以考据校辑为主（且前田家本尚未获知），对于此作品在文史学上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等的研究和阐释犹嫌不足。

方诗铭先生为小说史料对此书进行整理时说：“在中国古小说的发展史上，《冥报记》还是一部不能忽视的作品。唐代早期是六朝小说的继续到唐代传奇文盛大的过渡阶段。……从思想到文字，此书都是过渡性的作品。”李剑国先生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指出：“唐临此作亦为佛法鼓吹……。至其源流，则祖《应验》、《宣验》、《冥验》、《冥祥》等记，南北朝释氏辅教书之流绪也。”“所记专明报应，大抵因果地狱之说，叙事几成定式。……然《眭仁倩》、《柳智感》、《兗州人》、《皇甫兄弟》等篇，文笔曲折，乃见传奇之意，《冥祥》地狱之作已尚形容，至此尤剧矣。”两位先生都从志怪传奇小说的角度，对此作品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

但是，对于这部作品似乎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比如说，这部小说集里描写地狱的篇章很多，仅就数量而言，胜过六朝时期的《幽明录》、《冥祥记》等作品，但是对地狱的形象描写较之六朝小说却大为简略，很少见到前两部作品中那种对地狱阴森恐怖、刀山火海之类的渲染性描写，有时甚至让人感到形同人间牢狱。既有探望亲属的，亦有告状的、索贿的，俗世之气充溢阎王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关于记叙地狱的篇章中，对地狱审判、裁决之描写着笔尤多，占了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笔者以为，这与以前的地狱小说企图以渲染地狱之恐怖来震慑人心、从而让人弃恶从善的直观的写作方法不同，《冥报记》的撰者试图以强调地狱审判和裁决来展示人们生前的善业、恶业，向读者昭示善恶必报的因果之理。显然这与撰者的鼓吹佛教因果思想的著述意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冥报记》地狱描写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整部小说集紧紧围绕着宣扬佛教因果思想这一中心主题来加以组织、编撰，这一点在此之前的宣教小说集中（现存已知的）亦是所未见的，当为这部小说集的另一个特征。

另外，此作品不应仅局限于志怪传奇小说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像“眭仁倩”等篇章里所表现出的佛、道地狱观，以及唐朝佛、道

信仰与当时的文化风俗；“唐释信行”、“唐释僧彻”等篇章里记叙的三阶教的人物及事迹；“岑文本”、“郑师辩”、“傅奕”等当代历史人物的记叙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成为历史研究的参考素材。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亦当有其价值。较之国内学者，日本的学者似乎早已注意到了这些。

注：

①日本传存汉籍古写本·古版本的解说书。六卷，补医书一卷。有安政三年（1856）作的序。有日本书志学会影印的初稿本。流行本有中国六合之徐氏的活字版本、民国时期上海广益书局翻本及日本国书刊行会《解题丛书》所收本。

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册。

③引自明治四十三年六月日本油谷博文堂发行的高山寺本照相版《冥报记》的跋。中华书局本收入。

④⑥1653—1744。江户中期临济宗僧人，日本龙华院二世住持，晚年致力于著述。校勘、考证等著述甚丰。《冥报记校讹》初校于宝永六年（1709），以所获道越的一个写本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作校；后又获道越初写本于正德元年（1711），复校于《法华传记》，元文二年（1737）清写完毕。

⑤《冥报记校讹》载越本卷尾书云：“宽文八年戊申六月廿三日龕山沙门道越请梅尾山经藏原本而于槇尾平等心王院书之毕，自朝到斋后毕之。”

⑦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化研究所期刊。

⑧昭和五十一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

⑨参本文前出李剑国著书并加核实。

⑩昭和十二年四月刊前田家写本复制本所附简介。

⑪参片寄正义著：《今昔物语集的研究》上，1943年12月三省堂出版。

⑫1988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⑬参本文前出岑氏论文、方氏辑校书和李氏著书。

⑭参勉成社文库12《东大寺讽诵文稿》所附中田祝夫的解说。